

中國禪學思想史

〔日〕忽滑谷快天 著 朱謙之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禪學思想史

〔日〕忽滑谷快天 著 朱謙之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109号

中国禅学思想史

[日] 忽滑谷快天 著

朱谦之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刷 29.25 插页 5 字数 698,000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25-1499-4

B·198 定价: 29.20元

《禅学思想史》和六十年来 中日禅宗的研究

——代序

杨曾文

中国著名学者朱谦之教授在晚年把日本佛教学者忽滑谷快天的《禅学思想史》(中国部分)译成了中文,希望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但直到去世,未能如愿。此后因种种缘故,此稿在书堆中又沉睡多年,多亏黄心川教授留心此事,把它找出,又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的好意,把它出版。这确实是学术界的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忽滑谷快天(1867—1934)是日本近代早期著名佛教学者之一。东京人,自幼受曹洞宗的传统教育。一八八四年入东京的曹洞宗大学(现名驹泽大学),专攻佛学,尤致力于曹洞宗学,毕业后从善长寺住持忽滑谷亮童受法。一八九一年入庆应义塾大学,二年后毕业。此后在曹洞宗的高等中学、曹洞宗大学及庆应义塾大学等处任教,并从事佛教研究,发表《禅学新论》等。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开始,奉曹洞宗当局之命赴欧、美考察宗教和学术二年。一九一九年担任曹洞宗大学教头,后任此校校长。一九二五年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曹洞宗大学升格改名为驹泽大学,任校长。著作很多,有《禅学批判论》、《禅学讲话》、《禅之妙味》、《参禅道话》、《达磨和阳明》、《清新禅话》、《和汉名士参禅集》、《乐天生活之妙味》、《禅家龟鉴讲话》、《养气炼心之实验》、

2018/3310

《禅的理想和新人生的曙光》、《信仰和民力》、《禅学提纲》、《禅的信仰》、《普劝坐禅仪讲话》、《禅学思想史》上下二卷、《朝鲜禅教史》等。其中的《禅学思想史》上下两卷分别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五年出版，实际是忽滑谷快天的博士学位论文。

忽滑谷快天的《禅学思想史》是日本禅学和禅宗研究领域的划时期的代表著作。此书主要根据汉译佛教经典和中国佛教著述资料，考察论述了印度禅学的形成和禅学内容；作为佛教组成部分之一的禅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从南北朝至清初的禅宗逐渐形成、盛行、衰落的演变历史。本书结构严整，条理清晰，在论证中利用了丰富的传统佛教和禅宗的资料。在当时，本书被誉为禅学思想史研究的有力“杰作”。综观全书，有如下特色：

(一)全书从论述印度禅学入手，进而论述禅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演变，再考察禅宗形成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流传情况和禅法特点。全书原有两大部分：“印度部”和“中国部”。“印度部”的篇幅仅占全书的百分之十一，论述“外道禅”（婆罗门教和数论的瑜伽禅法）和“小乘禅”，旨在说明佛教的禅法源于在《奥义书》等文献中所表述的“外道”禅，但有发展。这一部分的内容，朱谦之教授没有译，仅译了“中国部”，故改题《中国禅学思想史》。

(二)全书以“中国部”为重点，按禅宗的发展阶段，分为六编：第一编是“准备时代”，写从东汉末安世高翻译小乘禅经到南北朝梁武帝时菩提达磨（本书不用“摩”字）来华，不仅介绍翻译禅经的情况，也介绍这一时期重要佛经的翻译。第二编是“纯禅时代”，特指从达磨来华至禅宗六祖慧能为止的禅宗酝酿和形成的时期。所谓“纯禅”是指达磨禅或祖师禅，谓信奉大乘教理，用普通佛教用语传法，不重棒喝机用等。第三编是“禅机的时代”，讲从慧能去世至五代之末禅宗分成五家的禅宗史，谓各家禅法重禅机，棒喝并用，宗风大变。第四编是“禅道烂熟的时代”

(前期),讲北宋的禅宗。第五编是“禅道烂熟的时代”(后期),讲南宋禅宗。“烂熟”是指如水果熟透了那种情况,已发展到极端,而物极必反。认为这两个时期由于教禅混淆、禅净合流,使禅道发展到烂熟,已孕育着危机。第六编是“禅道变衰时代”,讲元代至清乾隆时期的禅宗。认为儒释的融合,王阳明学说的兴起,念佛禅的盛行……使禅道名存实亡。

(三)本书为了论述清楚,采用三段表述方法:每编前有“概说”,提示每一个禅宗发展阶段的要点;每一章前有“略论”,讲各章中心内容和重要结论;各节为详述。有此安排,读者可根据需要选读不同部分。

(四)虽为禅学史专著,但所涉及的方面十分广博。值得注意的是,各篇章对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都有简明的交代;对各代帝王士大夫的奉佛、参禅的事迹,也多有介绍。宋明理学的形成,受禅宗的影响很大,本书对此也有论述。因此本书不仅对研究佛教,而且对研究历史、文化、哲学也有参考价值。

(五)本书各节篇幅不长,一般是提出论点后,再把所据的资料引上。这样做的优点是简明扼要,缺点是没有展用必要的分析说明;在不少地方,对一些可以作出不同解释的引文,没有进行诠释,做出明确结论。引证原文很多,但某些地方遗漏注明出处。

本书是日本近代以来第一部禅学思想史,在结构、体例以及论述等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不足之处是可以理解的。从本书发表至今已过了六十多年,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佛教研究与其它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一样,已取得巨大的进展。从现在来看,本书在资料的运用上存在着极大的时代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一) 没有看到敦煌遗书中的大量早期禅宗文献和禅宗史

书,其中主要的有敦煌本《六祖坛经》、神会《坛语》、《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神会录》)、《南宗定是非论》、《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等;

(二)没有充分利用保存在《全唐文》、《金石萃编》、各种文集等图书中的碑文、传记和其它实证资料;

(三)由于在论述禅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要运用唐中期兴起的禅宗南宗的史料,所以对禅宗的早期历史和禅宗整体不能做出全面客观的论证。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日本禅宗研究的旧时期的结束。此后由于敦煌禅籍等新资料的发现和使用,其它有关学科的进步,使禅宗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禅宗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取得巨大成绩。尽管如此,《禅学思想史》在今天对我们从事禅学和中国禅宗的研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不仅它所提供的资料和线索对我们仍然有用,而且一些论点仍能给我们深入研究以启发。

在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出版以后的六十多年中,日本的禅学和禅宗研究确实取得飞跃的进步,其重要原动力是大量敦煌禅籍的发现和利用。由于敦煌禅籍和其它新资料的发现与使用,日本学者对一向被忽视的早期禅宗的文献和历史;对禅宗北宗及南北宗的对立和斗争;对《六祖坛经》等南宗重要典籍的研究与整理;对禅宗历史和禅宗理论的考察研究,都取得众多成绩。在此仅作概要介绍。

(一) 《六祖坛经》新本的发现和研究

《六祖坛经》是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638—713)说法和生平的集记。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说,《坛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它最初形成之后,历代有人对它改编补充,产生过不同的本子。但

在明代《大藏经》把元代宗宝改编本《坛经》收编进去以后，其它诸本《坛经》逐渐湮灭无闻。日本学者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及其以后，陆续发现敦煌本《坛经》及源于宋本的兴圣寺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以及元代德异本《坛经》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研究。

敦煌本《坛经》（写本，斯坦因5475）。原题《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矢吹庆辉（1879—1939）一九二六年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中发现，校勘后在一九二八年把它收入《大正藏》第四十八卷之中。铃木大拙（1870—1966）对此进一步研究，一九三四年出版了由他校订的《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全书分五十七节，并撰文解说。此校本成为以后最流行的敦煌本《坛经》本子。此后宇井伯寿、柳田圣山、中川孝等人，也都对敦煌本《坛经》进行校勘或译成日文，并有大量研究敦煌本的论文。

敦煌本是现存最古的《坛经》本子。此本《坛经》不分节，后面师弟机缘（师徒关系）部分篇幅较少，谓此书是法海——道滌——悟真三代相承，当形成于九世纪中叶之前。

源于宋惠昕改编本《坛经》的兴圣寺本、大乘寺本等。在敦煌本《坛经》发现以后，启发日本学者搜寻古本《坛经》，后在京都兴圣寺发现宋惠昕本《坛经》。此本内分十二门，有小标题，版心有《千字文》中的“军”字，当是翻刻宋版本大藏经的本子，明显上承敦煌本，内载此书传承世系是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圆会五代。卷首有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兴圣寺僧了然从别本抄来的宋惠昕的序和宋晁子健的刊记。据此，惠昕于太岁丁卯（胡适考证为宋太祖乾德五年，公元九六七年），将一部“文繁”的《坛经》改成两卷十一门。此本是晁子健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所刻，底本是他七世祖文元公晁迥所读的《坛经》。铃

木大拙在一九三四年出版了由他校订的兴圣寺《坛经》，并著文介绍。

属于惠昕本《坛经》的本子，日本学者还在石川县大乘寺发现宋政和六年（1116）比丘存中刊本的抄本，称大乘寺本《坛经》，铃木大拙在一九四二年出版了此书的核订本，并附录两篇论文和索引。在日本金山天宁寺发现的惠昕本《坛经》写本，也是属于比丘存中刊本。在日本名古屋真福寺还发现了属于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周希古刊本的写本，是惠昕本的早期刊本，石井修道对此作了研究，并发表了校订本。

元代德异本《坛经》。德异在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据由他搜寻到的“古本”刊印此《坛经》，在元宗宝本《坛经》前所载德异之序中对此讲得很清楚。但德异本《坛经》有没有了呢？日本学者黑田亮、宇井伯寿、柳田圣山等经考察研究认为，朝鲜流传的《坛经》属德异本系统。据朝鲜嘉靖年间刻本《坛经》末尾所載高丽僧万恒在元大德四年（1300）写的序，德异刊印《坛经》后，托商人于大德二年（1298）送给万恒一本，托他刻印流行。此后多次印行。此本卷首有德异的序，有记述慧能略传的《略序》，正文分十章，书后有“宋太祖开国之初……至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得五百七十八年矣”的后记。

元宗宝本《坛经》。此为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南海风幡光孝寺宗宝改编的《坛经》。据宗宝的跋文，他是用三本校对，“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全书分十章，附“缘起外纪”、“历朝崇奉事迹”、“赐谥大鉴禅师碑”（柳宗元、刘禹锡）、“佛衣铭”、编者跋文。此为明代以后最流行的《坛经》本子。

《坛经》诸本的发现，为学者进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松本文三郎（1869—1944）是最早研究《坛经》的学者之一，在敦煌

本发现之后，于一九三二年写了《六祖坛经的书志学研究》的论文，对明本（即入藏的宗宝本）、敦煌本、兴圣寺本《坛经》作了比较研究，认为敦煌本是唐末《坛经》，但不是最早的《坛经》，也不算是善本，兴圣寺本以此本为基础作了发展，为现存一切本的基础。宇井伯寿（1882—1953）著《坛经考》（载《第二禅宗史研究》），对十几种版本的《坛经》进行考证，认为敦煌本虽不是最早本，但是现存本中最古的，是各本《坛经》的基础。在现存《坛经》中有敦煌本、惠昕本、德异本和宗宝本三大系统。明洪武本（1373）有朗简的序及契嵩的《坛经赞》，但正文与流通本不同，此或为契嵩本的翻刻。德异所寻的古本，或即为契嵩本，后世一般称为“曹溪原本”。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一九六七年版），对敦煌本《坛经》的作者、形成等作了考察，认为《坛经》是牛头禅派与神会禅派互相影响的结果，内容中的最古部分是无相授戒仪与般若三昧、七佛二十八祖等记述。这些原是牛头禅派之说，编者当为牛头禅派鹤林玄素（668—752）的门徒法海，而到牛头禅遭到禅宗内部批评之时，法海才被说成是慧能的弟子。后来《坛经》中又被增入慧能生平及十大弟子机缘部分。现本敦煌本《坛经》当形成于《曹溪大师别传》（781）与《宝林传》（801）之间。柳田在一九八五年的《语录的历史》中又认为，敦煌本《坛经》最初是师徒间传授的本子，到慧能第三代弟子悟真时又据神会的《坛语》，并吸收《金刚经》，《梵网经》等中的思想，重加以改编。一九八九年柳田在出席于我国台湾召开的国际禅学会议上发表《坛语与坛经》，认为不能设想在敦煌本以前有古本《坛经》存在，《坛经》实是从神会的《坛语》发展而来，“敦煌本《坛经》正是开元初期神会的新佛教运动的记录”，这种新佛教运动重视大乘菩萨戒的传受，受戒者以“自性清净心”为“戒体”，以“般若波罗蜜”为“学处”；《坛经》不仅以神会传戒授法的记录为基础，

而且吸收了《历代法宝记》、《曹溪大师传》的内容，可看作是“八世纪禅佛教思想史的成果”。中川孝在《六祖坛经》译注本（《禅的语录》之四）的“解说”中同意胡适的见解，认为《坛经》是神会或其弟子所编，敦煌本《坛经》中有不少地方与神会著作思想及语句一致。

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在一九七八年发表了《慧能研究》一书，其中对《曹溪大师传》及其它的慧能传记资料十八种、《坛经》、《金刚经解义》（传为慧能解义）进行研究，并对《曹溪大师传》用五本校订和训注，对《坛经》五本作了对校。这是日本学者研究慧能和《坛经》的重要成果。

（二）早期禅宗语录的发现和研究

禅宗有一个酝酿、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从菩提达摩来华至隋朝的僧璨，可看作是禅宗的酝酿期；至唐朝的道信、弘忍，是禅宗的正式形成期；到慧能、神秀分立南宗、北宗及以后南宗独盛天下，都可以看作是禅宗的发展期。各个时期都有相应的禅宗文献。但在本世纪发现敦煌禅籍之前，禅宗史书典籍几乎全是南宗的，因而对禅宗早期历史的全貌得不到了解。六十年来日本学者从敦煌文书中发现冠以菩提达摩之名的语录及其它早期禅宗文献有多种，推进了对早期禅宗，包括北宗和牛头禅派的研究。

（1）《二入四行论》一卷，在敦煌写本和朝鲜刊《禅门撮要》中都有。铃木大拙《禅思想史第二》将此文分三部分共一〇一段：前十一段为“达摩大师二入四行论及略序等”；十二至六十七段为“杂录第一”；六十八至一〇一段为“杂录第二”。第一部分前八段，详略不同地见于《续高僧传·达摩传》及《景德传灯录》卷

三十所载“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昙林序”及《楞伽师资记》所引的《四行论》。第十一段为《续高僧传》卷十六《僧可传》中的向居士的信。铃木认为前五十六段基本为达摩所述，后来认为第一、二两大部分皆为达摩所说；第三部分为慧可所述。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认为一——八段为达摩弟子所记，第九节以后皆非达摩述，大部分是慧可述。柳田圣山《达摩的语录》认为，这是初期禅宗修持者昙林、慧可、道育、向居士等传承禅法的记录，非一人著述。柳田《语录的历史》认为第一、二部分与《禅门撮要》本一致，皆为昙林所传，与慧可无关；第三部分为达摩、慧可禅系的师徒间的问答。

(2)《达摩禅师论》一卷，日本药师寺所藏敦煌本，关口真大《达摩大师的研究》首次发表(一九五七年)。首部缺，写于唐开耀元年(681)，主张“事中徐缓”、“唯净”、“唯善”三种“安乐法门”，虽是后人伪托之作，但对研究早期禅宗很有价值。

(3)《修心要论》一卷，全称《蕲州忍和上导凡趣圣悟解脱宗修心要论》，也称《最上乘论》、《一乘显心论》。虽题弘忍著，实当为弟子集记。敦煌写本有多种，刊本有《禅门撮要》本和安心寺本。铃木大拙《少室逸书》收有校印本，《禅思想史第二》所收是五本的校勘本。此论由十四段问答组成，记载弘忍“东山法门”的禅法主张。

(4)《观心论》一卷，《少室六门》称之为《破相论》，为神秀述。敦煌写本中有多种，刊本有《禅门撮要》本和安心寺本。一九三二年日本神尾弼春著《观心论私考》，据所发现的异本和《一切经音义》所载：“观心论，大通神秀作”，论证此论为神秀撰，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一九三六年铃木大拙发表此论的五本校本(载于《铃木大拙全集》别卷1)，但反对此为神秀著，认为是达摩述，由弟子记录的。此论主张坐禅观心，与宗密《圆觉经大疏钞》

卷三之下所说神秀北宗“拂尘看净”及《坛经》中批评的北宗“看心看净”的禅法是一致的。

(5)《大乘五方便北宗》一卷，有的写本名《大乘无生方便门》。一般认为是神秀的弟子记述的。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说神秀北宗的禅法是“拂尘看净，方便通经”。此“方便通经”，据此写本是依据《大乘起信论》、《维摩经》、《法华经》、《思益经》、《华严经》发挥所谓“总彰佛体”、“开智慧”、“显不思益”、“明诸法正性”、“了无异”五门，为北宗禅的纲要书之一。主张“看心”、“净心”等。铃木大拙《禅思想史研究第三》收有此论的四本校订本。

(6)《绝观论》，全名《三藏法师菩提达摩绝观论》，被认为是牛头法融著。写本有多种，铃木大拙在一九三五年于北京图书馆发现一种写本（北图八四），校刊后收入《少室逸书》，题为《观行法无名上士集》，认为是神会禅系的无名法师編集。一九三七年久野芳隆在《宗教研究》上撰文介绍了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三种《绝观论》敦煌写本。此后铃木大拙据此三种写本校写出全文，并在《佛教研究》上撰文介绍。一九四五年铃木大拙与古田绍钦发表了以石井光雄所藏《绝观论》写本为底本，用其它四种本子校订的《绝观论》。在一九七〇年柳田圣山发表了《绝观论的本文研究》（在《禅学研究》五八），介绍了以上五本之外另一种敦煌本《绝观论》，此后发表了用此六本互校的全文。关于《绝观论》的作者，久野芳隆和关口真大据《宗镜录》、《祖堂集》以及《圆觉经大疏钞》中所引的文字，撰文论证是牛头法融（594—657）的著作。柳田圣山在《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认为法融是承达摩《二入四行论》之意而作。铃木大拙在《禅思想史第二》中收有用巴黎本校订的石井本和北京本，但坚持此论为达摩所述。此论显受般若、三论影响，讲“空为道本”，“无念即无心，无心即真

道”，讲“绝观”，与法融《心铭》之“绝观忘守”有相通之处。

(三) 早期禅宗史书《楞伽师资记》、 《传法宝纪》以及《历代法宝记》

过去的中国禅宗史主要讲的是唐末以后的南宗史，所据资料也多是南宗的人编撰的。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传法宝纪》、《楞伽师资记》以及《历代法宝记》，提供了研究禅宗初创期和禅宗北宗、其它禅派的最新资料。

(1)《楞伽师资记》一卷，唐净觉撰。写本有多种，皆不完整。著者净觉(683—750)是唐中宗时韦后的族弟，从他所著《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载李知非之序、王维《净觉师碑铭》，可知其生平。此书当撰于唐开元四年(716)之前。胡适最早从敦煌遗书中发现此书三种钞本，交朝鲜学者金久经校订，后在金久经编的《菴园丛书》(一九三四年)中发表。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一九三〇年发现的一种写本(斯坦因二〇五四)，收在《鸣沙余韵》中影印介绍，后《大正藏》卷八十五所收本是以此本为底本，以金氏本校之的。此后关于此书的写本续有发现。一九五四年筱原寿雄在《内野台岭先生追悼论文集》中发表了《楞伽师资记校注》，是将《大正藏》本与金氏本重加校对的结果，又加注文，但仍缺卷首。一九六六年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书后所附资料中，吸收以往成果，又利用田中良昭新的发现，发表了新校订的《楞伽师资记序》，卷首补上所缺部分(从文义看，仍不全)。此序与以往学者所校正文合并，是一部迄今最全的《楞伽师资记》了。此书为传授《楞伽经》为禅法宗旨的祖师立传；求那跋陀罗、菩提达摩、惠可、僧璨、道信、弘忍和神秀、玄奘、慧安以及普寂、敬贤、义福、惠福，共八代十三人，各传详略不同。对他们的生平、禅法

思想作了介绍。其中“道信章”最长，主要引其所著《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在弘忍、神秀二章，主要引用玄奘《楞伽人法志》（约撰于七〇七年以后，记弘忍及弟子神秀、慧安的楞伽禅系传）。本书不重视法如和慧能，仅把他们列于传教于一方的弘忍的十大弟子之中。

(2)《传法宝纪》一卷，唐杜朏撰。矢吹庆辉《鸣沙余韵》（一九三〇年）及《解说》（一九三三年）中最早收有一种敦煌写本（伯希和二六三四），缺后部的三分之一。此后神田喜一郎又发现一个写本（伯希和三八五八），校订后在白石虎月《续禅宗编年史》附录中发表，此仍缺后面神秀的塔文。一九六〇年柳田圣山在友人的帮助下得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最完备的写本（伯希和三五五九）的照片，校订后发表在他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所附资料中，一九七一年将此书与《楞伽师资记》排印并译为日文，题为《初期的禅史 I》（《禅的语录》2）出版。《传法宝纪》的作者“京兆杜朏字方明”，可能是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全唐文》卷二八〇）中的“朏法师”，住大福先寺，义福从他学过大乘经论。日本学者多认为此书撰于开元初年（713），实际上当撰于开元四年至开元二十年（716—732）之间。书中记述相传为禅宗七祖：菩提达摩、惠可、僧璨、道信、弘忍、法如、神秀的略传及禅法主张。此书承《法如禅师行状》的祖统说，所谓达摩“绍隆此宗”，“入魏传可，可传璨，璨传信，信传忍，忍传如”，也以法如为第六祖，以神秀上承法如。此书明记从达摩至僧璨以《楞伽经》相传授，并在达摩传中批评“壁观及四行”。

(3)《历代法宝记》一卷。敦煌写本中有完整的本子，《大正藏》卷五十一所收的是以斯坦因五一六写本为底本，与伯希和二一二五对校的本子。此后矢吹庆辉《鸣沙余韵》及《解说》中收有此写本的影印本及介绍文章。一九三五年金久经又重校，收入

《董园丛书》中。此后又有多种写本发现，为校订此书提供了新的资料。一九七六年柳田圣山在《初期的禅史Ⅰ》（《禅的语录》3）发表他校订与日译的《历代法宝记》，并加详细解说。此书是唐代成都保唐寺无住（714—774）死后不久由他的弟子编撰的，宣传以保唐寺为中心的禅法为正统的禅宗史书。保唐禅派是相对于南、北二宗的另一禅系，因肃代二宗时的宰相杜鸿渐（709—769）曾从无住受法，故此派在今四川一带曾盛行一时。此书记禅宗二十九代祖相传世系，但把二十九祖菩提达摩称为菩提达摩多罗。利用神会的祖传法衣之说，编造此衣在则天武后时被诏送朝廷，后转授于智洗，经处寂、无相，传于无住，以此证明保唐禅派的正统性。无住的禅法以强调“无忆、无念、莫妄”为特色，说“一切众生，本来清静”……与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所说无住“但贵无心为妙极”、“灭识”是一致的。

（四）神会语录

弘忍死后，以神秀及其弟子普寂等人为代表的禅宗北宗，在以长安、洛阳两京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十分盛行。慧能的弟子神会（670—762）代表南宗出来与北宗辩论、抗争，使南宗影响日益扩大，安史之乱后在朝廷支持下南宗被确立为禅门正统。长期以来，神会的语录等文献在社会上佚失，仅靠宗密的著作等，了解其部分情况。一九二六年胡适最早发现敦煌遗书中的神会遗著，校订出版《神会和尚遗集》（详后）。日本学者对此十分重视，也发现了神会的遗著。石井光雄购入的敦煌写本中有一部神会语录，与胡适发现的《神会语录》有很多不同。一九三二年石井光雄将此件影印出版，题为《敦煌出土神会录》，附铃木大拙所著《敦煌出土神会录解说》的小册子。一九三四年铃

木与公田连太郎重加校订，题为《敦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并加上《解说及目次》，由森江书店出版。此录篇幅比胡适发现的《语录》略大，尾部有从达摩至慧能的六代相承略传及《大乘顿教颂并序》，最后题记中有“唐贞元八年岁在未，沙门宝珍共判官赵看琳于北庭奉张大夫处分，令勘讫。其年冬十月廿二日记”。此语录的原题当为《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为唐刘澄集记。胡适晚年所校的一个抄本就有题为“唐山主簿刘澄”写的序，有此书名。

以敦煌禅籍研究为重点的研究著作有很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这样一些：(1)铃木大拙《敦煌出土少室逸书》、《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禅思想史研究第二》、《禅思想史研究第三》，是铃木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对所发现的早期禅宗文献所作的校订、研究，对早期禅宗历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2)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一九三九年)，对菩提达摩及其弟子、牛头禅派、弘忍法嗣及北宗禅、神会、马祖与石头等禅系禅法，有详细论证，把传统的佛教史传资料、新发现的《祖堂集》、《宝林传》及碑铭资料、敦煌资料融为一体使用，别具特色。书后附有“北宗残简”，收有敦煌禅籍和传统史料多种。在一九四二年宇井又出版了《第二禅宗史研究》，其中的《坛经考》详细地介绍了诸本《坛经》的特色，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考证。此外几篇对南宗慧能及其弟子、南岳和青原两大法系、牛头禅派等作了论证。(3)关口真大《达摩大师的研究》(一九五七年)，对多种冠以达摩之名的资料，如敦煌本《绝观论》、《无心论》、《观心论》、《证心论》、《四行论》等作论证，对在日本发现的《达摩禅师论》作了重点论证。认为许多“达摩论”是后人伪托达摩之名而造的，如《观心论》为神秀撰，《绝观论》和《无心论》为牛头法融撰，等等。(4)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一九六七年)，前面多次提到，